

艺海钩沉

大风堂门人轶事

万君超

“大风堂”是张大千和二哥张善子两人共用的堂号。最早开始使用这个堂号的确切年份现在已经无法考证了，大致是在1925年左右。当年张大千居住在上海法租界西门路169号的时候，曾收藏了一幅明人张大风的《诸葛亮像》。张善子一向崇拜汉高祖刘邦，尤其喜欢那首《大风歌》，所以兄弟两人一致同意用“大风堂”作为画室之名。所以后来两人开堂收徒，传道授艺，所有男弟子们皆被称为“大风堂”门人。

张大千和张善子两人一生究竟收有多少名弟子，这也没有非常确切的数字。根据门人巢章甫、萧朴、陈从周三人于1948年10月所编的《大风堂同门录》，以及后来汪毅在2006年所编的《大风堂同门录》和《大风堂同门录（续）》，可知张氏兄弟从1925年到1983年共收弟子127位。其中张善子约有十几位弟子。其弟子人数之多（其中有女弟子40名），为现代画坛第一。其中还不包括后来被逐出“师门”的胡若思和晏济元两人。

从上述的资料来看，最早拜门“大风堂”的是安徽歙县人吴子京（生卒年不详），入门时间为1925年的上海，第二位应该是江苏都人胡若思（可能是第一人）。最后一名弟子的拜师时间无法确定，也从上述资料来推定的话，似乎应该是湖南人匡仲英，时间为1972年的台湾，所以曾有人将1956年到1966年期间张大千在香港和巴西所收的4位弟子：张师郑、孙家勤、沈洁、王旦旦，称之为“关门四弟子”，应该有误。

从现在已知的《大风堂同门录》的资料来看，他们的身份与其他画坛派别有不同之处。其中有夫妇同门的：萧建初与张心瑞、刘力上与俞致贞、李方白与宋继美、唐鸿与冯璧池、张师郑与王旦旦。有父子同门的：唐灏澜与唐鸿、王汉卿与王文卓。有张氏家族自己兄弟姐妹、子侄同门的。有一家五姐妹同门的：郁慕贞、郁慕洁、郁慕娟、郁慕云、郁慕莲。这样的“血缘”关系，看似巧合，其实说明大风堂在当时的名望，也为这一画派以后能够持续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张大千和张善子的收徒仪式完全是传统式的。我们不妨从当年何海霞（1908—1998）拜张大千为师的仪式中去了解一下详情。何海霞当年在北平画坛初露才华，尤以临摹古人的作品而为人称誉。他想拜旅居北平的张大千为师，就托琉璃厂佩文斋裱画店老板张佩卿代为介绍。因张大千与之素有交往，并时来店中观画。张氏就叫何海霞将一幅《锦鸡图》悬挂在佩文斋内。此图曾发表于当时的《艺林月刊》，是一幅临古之作，但笔力非常老到。果然，张大千见了之后，颇为赞许，并问了何海霞的情况。张佩卿见机提出何想拜其为师的愿望。张大千当时

并未允诺，只是表示愿意与何海霞面晤。

在1935年春的某一天，何海霞将其岳父资助他的一百银圆作为拜师见面礼，在北平虎坊桥附近的春华楼正式拜张大千为师。时有北平名士管平湖（画家兼古琴家）、刘北庵（收藏家）等人在座，颇为隆重。何行毕跪拜礼，再呈拜师礼金。张大千回赠《张大千画集》等。不久之后，张大千将一百银圆还给何海霞并说：“你送来银圆，执弟子礼，我如不收，非礼也。现在我还给你，表示师礼，你如不收，亦非礼也。我们都是寒士，艺道之教不计钱金！”此事曾在艺林传为佳话。

后来有人曾说，此事如果放在齐白石老人身上的话，那简直是不可想象之事。张大千收徒还有一件令人不可想象之事，那就是他可以委托“生平第一知己”李秋君（1899—1971）为其代为收徒并举行拜师仪式。李秋君出身于当时上海滩富豪世家，李氏家族是著名的宁波“小港李家”，以河海航运起家致富。李秋君的几位哥哥虽是商场中人，但均喜欢书画，所以与张大千交往甚密，堪称是张大千早年重要的艺术“资助人”。李秋君与张大千结识之后，也成为翰墨密友。李后来曾有意与张大千结成佳偶，但张大千已有二房夫人。按李氏家族当时的声望，李秋君是断不可能做人小妾的。所以这段姻缘终究未能如愿，而张大千一直将她视为“红颜知己”，不似夫妻却胜似兄妹，而李秋君为之

终身未嫁。所以张大千有时不在上海，而又有人想拜其为师，则全权委托李秋君作代理人，或决定收与不收，俨然是“师娘”和“二堂主”的身份。这在当时的书画界里也是一件绝无仅有的奇事。

张大千招收弟子是否有什么具体的标准？按常理首先应该看是否有一定的绘画天赋和基础。但有时也并不尽然。张大千是一个非常善于交际和自我经营之人，所以在收徒方面也会较多考虑自己的社会人脉关系，因此有时收弟子的标准也比较随意。比如女弟子叶名珮，出身富家，喜琴棋书画，尤其精擅古琴。曾拜苏州籍女画家顾青瑶学画，而顾与李秋君关系密切。顾青瑶后来就推荐叶名珮拜张大千为师，经李秋君引见，张大千同意与其见面之后再定。张大千闻知叶擅古琴，亦不看她的画作，遂取出家藏一张古代名琴，命其演奏一曲。张大千听罢大喜，当即举行仪式收弟子。

一般而言，拜大风堂门下学画者，如果学画并非纯为谋生，实属陶冶性情，流连风雅，则张大千对弟子的入门标准就相对较低。反之则相对较高，主要是看此人的书画基础或是否有此天赋和悟性。比如何海霞、胡若思、刘力上、俞致贞、田世光、曹大铁、巢章甫等人都属此例。有时也是为了营造一种轰动效应和扩大知名度，比如1945年冬在上海李秋君家中，同时收郁氏五姐妹为大风堂女弟子，时人曾称之为“五美拜

张大千在1925年左右所收的“开门弟子”胡若思（原名俨，1916—2004），是一位书画鉴藏家之

子。他的父亲是张大千作品的代理商，所以关系甚密。胡若思从小就受家庭环境熏陶，所以对绘画极具天赋和悟性，胡父在儿子9岁时就让他拜张大千为师。此时张大千画名未彰，仍在倾心临摹和仿作石涛、八大山人的作品。而胡若思随师学画时，即深受熏习。数年之后临摹石涛作品几能乱真，尤擅石涛浅绛山水，笔墨风格神似张大千，有时张大千画债甚多，且有指明要石涛风格山水，难以应接。就让胡若思代笔，他再修润题跋钤印，当时竟无人知是弟子代笔和师傅“合作”。抗日战争爆发之后，张大千被日本人软禁在北平，无法脱身南下，且有谣传已经“遇难”。胡若思就在上海伪造张大千画作百幅，其中尤以石涛风格浅绛山水居多，并举办画展，名曰“张大千遗作展”。人皆不知其伪亦难辨真假，遂抢购一空，因此引起上海大风堂其他弟子的公愤。后张大千设计逃离北平，到上海之后，登报声明，将胡若思逐出“师门”，永不相认。笔者近年常在朵云轩和上海文物商店中，鉴阅胡若思早年在大风堂门下时所作石涛风格的设色山水，笔墨之苍道和秀润，真叹为观止。

叶浅予先生曾有诗曰：“大风门下士，画迹遍寰中。”据汪毅所编著的《大风堂的世界》一书中不完全统计，遍布海内外的大风堂再传弟子多达380余人，完全可以称之为“大风堂画派”，而且这个画派的影响力不是任何一个其他个人画派可以与之相提并论的。而张大千正是这个画派的“精神领袖”和“开山宗师”，这是一个具有传统人文精神的画派。不管你喜不喜欢，承认还是不承认，“大风堂画派”在中国当代画坛上的影响力，至少还可以持续100年左右，甚至更为长远。

（作者为书画鉴藏家）

是“文化”的历史。

西方“文明”的一面大家都看得到，也应当看到，但同时也要看到其煌煌表象背后的野蛮。对于中国几代崇拜西方的知识人来说，了解西方“不文明”的一面，弄清今日西方“民主”表象下财阀统治之真相，无疑更为需要。

但当今世界的主要媒体完全掌控在一小部分犹太—盎格鲁财阀手里，长期给全世界的芸芸众生洗脑。他们操纵了世界舆论，过滤、虚化、封锁甚至立法禁止他们不欲大众知道的信息，同时大肆传播他们想要大众接受的信息，比如今天的甲流疫情、碳排放概念等。

中国的“为民”政治思想，是人类政治文化中的奇葩，为中国文化所独有（拙著《民主的乌托邦》有论述），于今依然影响着中国政治现实。中国在2000多年前的秦朝就完成的行政中央集权（郡县制），是非常先进的社会管理形式，西方只是到了现代民族国家的形成才告完成。中国选贤与能的科举制，也是西方现代公务员制度的模仿原型。中国传统社会形态，曾经是西方17、18世纪众多哲人们心目中理想社会的楷模。孔夫子（Confucius）的名字响彻当时欧洲的知识界。孔子的画像，法国启蒙大师伏尔泰悬于书房，持礼供奉。

论哲人思辨——诸百家，儒道释三脉，智慧辉耀千古；论诗文——诗经屈骚，唐诗宋词，其多情其音韵，无与伦比；论绘画——宋元山水，其静观其远离尘俗，西方风景画不可同日而语；论音乐——古琴琵琶洞箫二胡等，与西方音乐各有千秋；论戏曲——京剧越剧秦腔豫剧黄梅戏，苏州评弹等，无不声腔优美动人心魄，足与西方戏剧等量齐观……

但在百年中国文化人眼中，中国历史只是专制残暴，而西方历史则代表了一部“文明正史”。

事实是，西方自古罗马毁于蛮族入侵，之后长期处于真正的黑暗之中。文明断裂，暗无天日。古代典籍除了流落拜占庭帝国一部分，主要幸存于阿拉伯世界的大规模翻译才得以留存。后来的欧洲人主要是通过阿拉伯译本才了解古希腊古罗马哲学和科学知识。就是说，西方“人本主义文明”，是到阿拉伯文化那里拐了一个大弯，才得以延续。只是今天西方主流学界羞于多提。

在长达1000多年的所谓“中世纪”，西方强盗横行，民不聊生，瘟疫蔓延。那一轮又一轮的十字军“东征”，其实是打着宗教旗号，一次又一次西方的“倭寇”到东方来烧杀抢掠，到处屠城。那些个国王，不过是一些“倭寇”强盗头目而已。（西历17世纪的英国伊丽莎白女王，还跟海盗合伙做生意，人称“海盗女王”）农民们只好依靠城堡保护的贵族领主当农奴。绝望之下，宗教兴盛。所以当时欧洲人到处都拼命垒石块，建造向上飞升的哥特式教堂。当时的拜占庭和阿拉伯世界远比西方更文明。

所以西方的历史、文化和社会，并非如中国“知识分子”想象的那样完美，那样“文明”。

事实上，人类各文化各有其特性，各有其利弊长短。一种完美的文化或历史是不存在的。过去不存在，将来恐怕也不会存在。中国的文化历史毫无疑问有很多问题，正如西方的文化历史也有很多弊端。但问题是弊端不能遮盖中西文化的智慧成就。正因为如此，人类文化才显得丰富多样，缤纷多彩。也因为如此，我最推崇的西方当代学者是，倡扬“文化多样性”的法国文化人类学家列维·施特劳斯（C. Levi-Strauss），和倡扬“文化个性”（cultural identity）的美国学者亨廷顿。

“五四”以来，中国人自揭疮疤，自虐自贱，已经够了。中国文人自绝于自己文化传统的惨烈，人类文化史上绝无仅有。

人必自侮而后人侮之。一个在文化上自侮的民族，是永远没有希望的，更遑论“复兴”？中国人再也不应该无知地轻贱自己的文化，膜拜别人的文化。如果今天的中国人还不能真正反省百年中国

的文化自卑文化自虐，反省百年中国在文化精神上丧魂落魄向西方跪，那将是我们的失责和罪过。

新中国已过了60年一个甲子，激烈否定自己文化的五四运动也已过去90年，一个半甲子。应该有一个历史的转折了！

（作者为浙江大学人文学院教授、美术批评家）



夏收（水粉） 1972年 袁运甫

博文选登

化的——

1992年的《秋菊打官司》，片头书法代表当时书坛较高水平。清朗雅健，睹之神清气爽。

1994年的《活着》，用笔厚重拙朴，艰涩凝重，与片中之意甚合。

1999年的《我的父亲母亲》，类似钢笔书信效果，很有趣味。

2004年的《十面埋伏》，书法甚佳，融合碑帖、厚重灵秀，摇曳多姿，诡谲莫测。

2005年的《千里走单骑》，书法很好，厚重饱满，不乏灵动稚拙。

2006年的《满城尽带黄金甲》，江湖俗书。

2010年的《三枪拍案惊奇》，书法更加拙劣低俗。

由上可知，张艺谋还是挺重视片头书法的。甚至从2002年到2005年，还有专业的书法家。2008年之后，启用江湖俗书，一无可观。从张艺谋、浑浊拙劣的片头书写来看，大概预示着张艺谋电影的一个新方向。

书法与大众越来越隔膜了。绝大多数人，对于书法的美丑已经没有判断能力了，哪怕是艺术

家，著名的视觉艺术家。长此以往，这门艺术不会有很好的将来。

邱才桢（书法家）/文

艺术学科 教改设想

本人一直认为目前艺术学科的专业设置分得太窄太细，学生的创造力不强，易陷入匠人的窠臼，与时代脱节。因此，在今后担任学院一把手期间，打算推行将本院本科设置的设计、新媒体、油画、中国书画、版画、雕塑等专业打通的教学改革计划，即：四年本科中的前三年（或两年半），所有学生都必修上述专业，本科四年级再根据个人情况分专业。

中国大学的口号是：宽口径，厚基础。这个口号对于艺术教学来说也极为适用。

好的教育应该不仅重视技

能，更应该重视学生创造力的培养；也许我们一时没有给学生毕业就能够找到工作的技能，但是我们试图为学生一生的发展负责。

另外，在教师当中提倡独立思考精神，在学科建设中加强当代艺术理论研究等等，也是今后要反复强调和实施的。

徐唯辛（画家）/文

牛起来 靠什么

赵本山春晚演出的一个小品《捐款》，里面有句台词：“美国人成啥样了，不也上咱这儿借钱来了吗？”此语一出，顿时引起台下欢呼。为什么这句台词能够博得观众的喝彩？原因是它让中国人找到了某种自信，有一种扬眉吐气的释放感。网上有诸多评论，说这与事实并不相符。

物质与技术果真能够让中国人找回自己的尊严吗？显然不行，物质与技术只是外在条件，如果内在的精神品质得不到提高，物质与技术就不可能转化为塑造自尊的能量。梁启超、蔡元培、鲁迅等人清醒地意识到了这一点。他们纷纷向国民性开刀，从内部进行文化与思想启蒙，就是想改变丧权辱国的处境下滋生出的那种卑怯心理。

可以说，今天中国的崛起，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当年那些有识之士的文化启迪。如果没有他们站在历史的转折点上唤醒铁屋子里沉睡的国民，重新灌输进普世的人文价值，中国今天的改革开放不会获得前行的动力，也就不可能迎来腾飞的局面。这是中国近现代史发展的一条主线，我们不能视而不见，更不能得意忘形。要知道今天中国的经济增长，并没有带来整体国民水平的提高，尤其是人文素质方面，不要说跟西方比较，就是与“五四”时期也不可同日而语。这就像我们越来越庸俗不堪的春晚一样，把低俗的打情骂俏捧为主旋律，早已呈现出末路狂花的景象。

杨卫（策展人）/文